



# 《左传》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析

吴灿新

**摘要:**《左传》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更是一部精彩的思想史著作。《左传》中最精彩的是其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蕴含了德治、仁政、信用、修德、守礼等思想内核。《左传》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以史实隐思想;二是以价值导史实;三是表露思想的方法多样化;四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左传》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一是对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要启示;二是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左传》;政治伦理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德才兼备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1-0051-07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作者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而《左传》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尤为值得进行深入的学术探究。

## 一、《左传》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左传》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十分丰富,涉及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德治。《左传》所记述的史实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重点则是各诸侯国君主的治国之道。周朝建立后,实施分封诸侯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形成众多列国诸侯。《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sup>[1]1271</sup>。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拥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

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许多治国无道的君主往往由于内乱或者外侵导致灭国;反之,一些治国有道的君主不仅可以使小国变大国、弱国变强国,还可以号令其他诸侯国,形成一代霸业。因此,关注与记述君主的治国之道必然成为《左传》的重点。

《左传》中有大量关于君主治国之道的记载。其中,《左传·成公十八年》记录晋悼公的治国之道最为典型:“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sup>[1]615-616</sup>可以说,晋悼公即位后能够建立霸业,就在于他治国有道,核心者无外乎“德治”。《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灵王派椒举到晋国去求得诸侯的拥护,晋平说:“晋国的地势险要而多产马匹,齐国、楚国祸难又多。有这三条,到哪儿不成功?”其大臣司马侯则谏道:“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

收稿日期:2020-09-13

作者简介:吴灿新,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伦理学会名誉会长(广东广州 510053),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

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享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兴。”<sup>[1]696</sup>司马侯认为，兴国强国之道，不能仗着地势险要和马匹多产，更不能依仗邻国的祸难，其根本是应修明政事和德行，历史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左传》之所以十分推崇“德治”的治国之道，既是渊源于尧舜开创的“德治”传统，也是受周公与孔子“德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不仅自身为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德治典范。“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sup>[2]2</sup>后尧帝年事已高，将舜列为帝位候选人。舜慎重地赞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都能顺从。舜总理百官，百官都能承顺。舜在明堂四门迎接四方宾客，四方宾客都肃然起敬。通过三年的政务考察，尧帝认为舜政事谋划和言论都符合帝位要求，于是禅让。周公则总结了夏商两代特别是商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虽说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是“天命”，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sup>[1]194</sup>。“天命能否眷顾，从根本上说，就看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是否有德。”<sup>[3]</sup>孔子继承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论，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sup>[4]9</sup>用德行来治理国政，实行“德治”，必然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sup>[4]208</sup>

其二，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左传》中的思想认为，实行仁政首当以民为本。民本主义精神萌芽于远古，形成于西周，《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sup>[1]187</sup>周公进而指出，既然天命以德为本，国家以民为本，统治者如果想要永远保住政权，就必须“敬德”“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sup>[1]156</sup>《左传》继承弘扬了西周的民本主义精神，认为民不仅是国之本，也是神之主，治国之道重在忠于百姓。《左传·桓公六年》载，楚武王入侵随国，随国大臣季梁认为，小国只要忠于百姓就不惧大国的侵犯。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sup>[1]484</sup>《左传》又认为，既然民不仅是

国之本，还是神之主，治国就不能迷信神明，必须聆听百姓的意见，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史闾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sup>[1]501</sup>还进一步认为，既然民为国之本，实行仁政，首要的是要爱护百姓，体恤百姓，这是“仁”的题中应有之意。《左传·襄公七年》载：“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sup>[1]625</sup>昭公七年，士文伯说，应对灾祸，“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sup>[1]706</sup>。要爱护、体恤、顺应百姓，关键是要对百姓有利。文公十三年，邾文公为迁都问吉凶。史官说：“对百姓有利而对国不利。”邾文公则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sup>[1]557</sup>

《左传》记述，实行仁政重德就应循规律讲规矩。早在周代，就已有施政应循规律讲规矩的思想。《尚书·洪范》载，周武王向箕子请教天道，箕子说，禹时，天帝就已将“大法九章”传授给了他。“大法九章”一是“五行”，二是“敬用五事”，三是“农用八政”，四是“协用五纪”，五是“建用皇极”，六是“义用三德”，七是“明用稽疑”，八是“念用庶征”，九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sup>[2]138</sup>。孔子也强调治国有“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sup>[4]198</sup>《左传》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主张施政是有规律有规矩的，违反施政规律和规矩就会陷入危局。《左传》多有记载，如桓公二年，鲁桓公从宋国取来郕国大鼎，置于太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sup>[1]481</sup>庄公八年，齐襄公即位，施政没有准则，使人不知所措。鲍叔牙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sup>[1]492</sup>国君放纵，百姓懈怠，祸乱将要发生了。

其三，信用。自东周开始，周朝由强转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导致诸侯国之间信用危机。《左传》依然坚守诚信之道，对不讲信用的事件与行为进行了抨击，并由此表露了其关于信用的政治伦理思想。最早有“信”记载的是《尚书·汤誓》：“尔无不信，朕不食言。”<sup>[2]91</sup>孔子特别重视

“信”的价值,他强调君子要“主忠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sup>[4]17</sup>。人要有信,治国更要有信。《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sup>[4]135</sup>《左传》也强调,信用是国家的宝贝,是庇护百姓的保证,比什么都重要。僖公二十五年冬,晋文公率军包围原国,命令三天原国不投降就离开。间谍从城里出来,说:“原国准备投降了。”领军将领说:“请等待一下。”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sup>[1]531</sup>令退兵三十里,结果原国投降。

《左传》认为,信用是国家的宝贝,庇护百姓的保证,作为君主必须首先做到诚信,这是天道。襄公二十一年,鲁国臧武仲对季武子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sup>[1]647</sup>襄公二十二年秋,栾盈从楚去齐,齐不接纳。晏平仲劝齐庄公:“失去信用,不能立身立国。君王还是考虑一下。”齐庄公不听。晏平仲叹息说:“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sup>[1]650</sup>不讲信用,就是自取灭亡之道。《左传》载,僖公十三年冬,晋国发生饥荒,秦国卖粮给晋国;但一年后,秦国发生饥荒,到晋国请求购粮,晋国不给。晋国大夫庆郑批评说:“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sup>[1]516</sup>没有信用就会发生患难,失掉了救援,必定灭亡。

其四,修德。君主要以德治国,实施仁政,注重信用,就必须修德,进而以身作则,才能使百姓安宁,国家强盛。周公就认为,要实行“仁政”,统治者自己首先要努力修养德行,成为有德之君,这是能否承受天命的决定性条件。因“天命”历来都是眷顾有德之人,而厌弃无德之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sup>[2]216</sup>孔子也特别重视修德,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sup>[4]68</sup>只有修好德,以身作则,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左传》十分赞赏前人高度重视“修德”的思想,认为作为君王的根本条件,就是要有德行。隐公三年,穆公说:“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sup>[1]473</sup>僖公五年,虞公认为自己祭祀的祭品丰盛又清洁,神明

必定保佑。宫之奇说:“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sup>[1]510</sup>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修行德行都是极端重要的。子产就说:“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sup>[1]655</sup>《左传》为此指出,立德乃三不朽之首:“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sup>[1]655</sup>君王修德应当以身作则,《左传·闵公二年》记载了卫文公以身作则,使国家由弱变强的故事:“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sup>[1]506</sup>

《左传》反复强调,君主如果不修德,没有德行,甚至抛弃德行,一定会遭灾。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sup>[1]528</sup>《左传》为此提出:君王要避免灾祸,就应当取法于善,弃恶扬善。《左传·襄公十三年》载君子之说:“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sup>[1]635</sup>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强调:“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sup>[1]682</sup>有德行而又合于法度,有德行就不会失去百姓,合于法度就不会办错事情。

其五,守礼。“礼”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舜继位,“修五礼”。周公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制礼作乐”而成“周礼”,对于巩固西周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周朝的衰微,天下已经礼崩乐坏。孔子一生都在努力,企图恢复礼制天下。“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政”则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如何能够成“仁”,施行“仁政”?孔子寄希望于“复礼”。《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sup>[4]131</sup>在孔子看来,实行德治与仁政,不仅要靠道德,还要靠礼制。《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4]10</sup>孔子强调,道德礼教是治国之根本。

从《左传》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礼制”思想与周公和孔子一脉相承。《左传》主张,“德”与“礼”都是治国之道。僖公七年,管仲言:“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sup>[1]511</sup>事实

上,礼是德的外化,德是礼之内质。《左传·文公元年》载:“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sup>[1]544</sup>在《左传》看来,礼是德治仁政之根本保证。“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sup>[1]743</sup>“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sup>[1]479</sup>

因此,违反了礼制,就一定会发生动乱。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言:“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sup>[1]649</sup>《左传·文公十五年》载:“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多行无礼,弗能在矣!”<sup>[1]560</sup>礼用来顺服上天,这是上天的常道。多做不合于礼的事情,这就不得善终了。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古代社会的礼制本质上是维护等级制度,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左传·隐公五年》载:“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sup>[1]475</sup>《左传》坚决维护礼制等级制的态度,可以说,与孔子无二。据《论语·颜渊》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sup>[4]19</sup>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己的庭院中用八佾舞蹈,这是天子的规格,于是遭到孔子猛烈的批评。

《左传》认为,治国理政要讲德治施仁政,依礼制,然仅此不行,还应有刑法为保障,做到刑德结合。这一思想,在尧舜时代就已萌生。《尚书·尧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sup>[2]23</sup>周公在写给前去卫国上任的康叔的书信中告诫说:“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sup>[1]149</sup>主张修明德行和谨慎刑罚,要“敬明乃罚”<sup>[2]181</sup>。要注意特别慎用刑罚,加强道德感化。《左传》继续拓展了这一思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sup>[1]664</sup>因此,《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赞扬了严明刑罚的晋文公,君子认为,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sup>[1]537</sup>。《左传·隐公十一年》中也批评了失掉了政和刑的郑庄公,君子说:“郑庄公失政刑

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沮之,将何益矣!”<sup>[1]479</sup>

## 二、《左传》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

《左传》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如下。

其一,以史实隐思想。《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然而,其并非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而是在大量的史实中隐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尤其是政治伦理思想。“隐含”是指它并没有直白地书写作者的思想,而是通过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史实,而隐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左传·隐公四年》载,鲁隐公向众仲询问:“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sup>[1]474</sup>《左传》借鲁国君卿对卫国州吁弑君夺位之议论,传递了作者主张德治仁政,反对仗恃武力暴虐百姓的思想。

其二,以价值导史实。求真是史人(官)的使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国史官为记录崔杼弑君真相而前赴后继、勇于献身的感人故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sup>[1]658</sup>当然,求真不仅是史人(官)的使命,向善求美也是史人(官)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实的记载都隐含着作者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左传》隐含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导向是与尧舜以来直至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作者在记录史实时,客观上处处都受其价值立场和价值导向指引。《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鲁、齐、郑攻许,许庄公逃卫。齐侯以许国予鲁,鲁侯不受,转让郑。郑庄公使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许都东部,而使获处许都西部辅佐之。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sup>[1]479</sup>

其三,表露思想的方法多样化。《左传》表达

政治伦理思想的形式方法是多样的。首先,以作者信奉的价值标准来记录。如《左传》的价值标准中,最常用的是“礼”,因此常以“礼”来标准史实。《左传》载,僖公二十七年夏,齐孝公去世。鲁国虽然对齐国有怨恨,但仍没有放弃对邻国君主的吊唁,“这是合于礼的”。文公元年,鲁文公继位,派穆伯到齐国去,开始聘问,“这是合于礼的”。其次,以历史人物的言说来反映。《左传》中有大量历史人物的说辞,而作者对其是欣赏的。《左传》载,僖公二十四年,郑文公不听周襄王的命令,周襄王发怒,准备领着狄人进攻郑国。富辰劝谏道:“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鬻,奸也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sup>[1]528</sup>庄公十年春季,“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sup>[1]493</sup>最后,以圣人之议论来表现思想。例如,成公二年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幸免于难。不久,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仲叔于奚辞谢,而请求得到诸侯所用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卫君允许了。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sup>[1]587</sup>隐公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sup>[1]476</sup>

其四,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前面论述了《左传》最主要的政治伦理思想,实际上《左传》还有许多其他精辟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国君之

威仪。襄公三十一年,卫襄公询问北宫文子何为“威仪”?答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像,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sup>[1]684</sup>然《左传·昭公二年》还指出,《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sup>[1]692</sup>要警惕滥用威仪,以亲近有德的人。其次,礼与其他德品的紧密关系。《左传·襄公十三年》中,君子曰:“让,礼之主也。”<sup>[1]635</sup>说的是让与礼的关系。昭公二年,叔向之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sup>[1]692</sup>说的是忠信、卑让与礼的关系。成公十五年,申叔时言:“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sup>[1]607</sup>说的是信与礼的关系。成公十三年,孟献子曰:“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sup>[1]603</sup>说的是信与敬的关系。文公十八年,大史克道:“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sup>[1]564</sup>说的是德行与礼的关系。最后,各种政治美德。成公十七年,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sup>[1]614</sup>昭公十年,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sup>[1]712</sup>成公十三年,刘子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sup>[1]603</sup>《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sup>[1]640</sup>文公十八年,大史克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sup>[1]564</sup>又说,从前高阳氏有八位才能强的子孙,他们中正、通达、宽宏、深远、明智、守信、厚道、诚实。高辛氏有八位才能强的子孙,他们忠诚、恭敬、勤谨、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

### 三、《左传》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左传》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今日,《左传》蕴藏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伦理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其一,《左传》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要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sup>[6]18</sup>,既是我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从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中可以看到,“德主刑辅”的德治模式,至少从尧帝起就开始了。但与此同时,德治并没有排斥“法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sup>[7]138</sup>。《尚书·尧典》记载,尧帝让舜接班,舜不仅“慎微五典,五典克从”,而且还“象以典刑,流宥五刑”<sup>[2]23</sup>。到了周代,“德主刑辅”的德治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周公认为,实行“德政”一方面要施于礼教,另一方面还应当辅以刑治。《尚书·吕刑》说:“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sup>[2]332</sup>孔子大力弘扬周公的“德政”思想,也认为实行德治,施行“仁政”,还需要辅之刑治。在《礼记·坊记》中,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sup>[1]424</sup>孔子认为,君子的治民之道,就好像防止河水漫溢堤防,是为了防止百姓出现过失。虽然周密设防,却还是有人犯规。所以,君子用礼来防止道德上的过失,用刑来防止邪恶的行为,用教令来防止贪婪的欲望。《左传》继承发扬了周公与孔子的德治思想,不仅提出了宝贵的“德治”“仁政”思想,还提出实行德治仁政应当循规律讲规矩辅刑法。如昭公六年,郑国重臣子产不仅重视德治,还把刑法铸在鼎上,并说:“吾以救世也。”<sup>[1]704</sup>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以从《左传》丰富的“德治”“仁政”思想中汲取精华。

其二,《左传》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离不开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

早在尧舜时代,无论是选取禅让对象还是任免官员时,都十分注重以德为主,德才兼备的标准。《尚书·尧典》载,尧帝在位十七年后,开始挑选帝位的候选人。有大臣推荐尧帝之子丹朱,尧帝说,他缺德又凶狠,怎么能行!又有大臣推荐共工,尧帝说,他是个两面人,也不行。众大臣于是推荐了穷困的舜,尧帝问道,此人如何?众大臣介绍说:“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sup>[2]13</sup>于是,尧帝决定选取舜为帝位的候选人并进行考察。虞舜在选取帝位候选人时,也同样十分重视德才兼备的人才。经过考察,虞舜选取“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有功的禹。周公根据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将帝王是否选任有德之人为辅臣,上升到关乎国家兴亡之高度。他指出,夏亡就在于“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sup>[2]285</sup>。商王纣败亡,也因“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sup>[2]286</sup>。所以,“国则罔有立政用俭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sup>[2]292</sup>。只有选贤任能,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由此,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德性的修养。《尚书·大禹谟》载,舜帝问政于大臣,大禹说,施行德政,首在修德。“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sup>[1]186</sup>凡是顺道从善的就得福,逆道从恶的就得祸,这真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大禹即位,也问政于大臣。皋陶说,王者要诚实地履行美德,就必须“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迓可远在兹”<sup>[2]39</sup>。孔子也主张行仁政必以修身为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sup>[4]151</sup>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成为一位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sup>[4]179</sup>。在前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传》十分重视并发扬前人“修德”的思想,主张君王者,必以德为重。如隐公三年,穆公说:“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sup>[1]473</sup>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修行德行都是极端重要的。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就说:“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sup>[1]655</sup>《左传》还赞扬了许多政治美德,如信、知、勇、敬、忠、勤、宽、慈等。这些思想,对我们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因为“德,

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sup>[8]</sup>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其三,《左传》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左传》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内容有“德治”“仁政”“信用”“修德”“守礼”等,无疑是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民主”最早出自《尚书·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sup>[1]191</sup>君主没有人民就无人任用,人民没有君主就无处尽力。不可自大而小视人,小视人就不能尽人的力量。平民百姓如果不各尽其力,就没有人帮助君主建立功勋。可见,古代“民主”的实质就是民本主义。古代“爱国”主要内容包括“忠君”与“爱民”。在古人看来,君王是国家的象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故“爱国”的根本就是民本主义。周公认为,既然天命以德为本,国家以民为本,统治者如果想要永远保住政权,不仅必须“敬德”,而且还要重视“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sup>[1]156</sup>《左传》继承弘扬了西周的民本主义精神,认为民不仅是国之本,也是神之主,治国之道重在忠于百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sup>[1]484</sup>既然民为国之本,实行仁政,首要的是要爱护百姓与顺应百姓;而这一切关键都要看是否对百姓有利。“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sup>[1]557</sup>而今天我们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其实是对“民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也是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爱国”的根本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总体而言,《左传》不仅是史学的经典与范本,其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左传》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伦理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 参考文献

- [1]崔富章.中国文化经典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 [2]顾迁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3]吴灿新.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J].齐鲁学刊,2012(3):26-30.
-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8]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34-38.

##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thics in *Zuo Zhuan*

Wu Canxin

**Abstract:** *Zuo Zhuan* i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work of chronicle, but also a wonderful work of history of thought.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is his political ethics. Its main contents are: “rule of Virtue”, “Benevolent Government”, “credit”, “moral cultivation”, “observing etiquette” and so on. It shows that its political ethics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One is to conceal the thought with historical facts; the other is to guide historical facts with value; the third is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ought methods; and the fourth is to be rich in thought content. It has important contemporary value: firstly, it has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insist on 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ruling the country by virtue; secondly, it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cultivate the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talent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irdly, it has historical resour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cultiva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Zuo Zhuan*; political ethics;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both ability and morality

[责任编辑:李 齐]